

# “预言”的终结与社会理论的危机

闻 翔

**摘要** 近二十余年来，对“元分析”意义上的社会理论的祛魅正在成为当代西方社会学知识生产的一个显著趋势，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预言”的终结，即对以“时代预言论”为特征的社会理论写作范式的批判和疏离。“预言”的终结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频繁定义新纪元的理论“翻新”给人带来的审美疲劳之感；对“预言”将过去与当下截然分开的二元论和目的论倾向的反思。但是，“预言”的终结也伴随着总体视野的式微和历史意识的弱化，由此带来一系列非预期后果，包括研究尺度的“盆景化”、认识论的“当下主义”以及问题意识的“去结构化”。这也体现了社会学家的“职业退守”困境。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需要以西方为镜鉴，超越而非尾随，进取而非退守，以总体视野和历史意识观照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从而建构中国自身的社会理论。

**关键词** 预言的终结 社会理论 二元论 盆景化 当下主义 职业退守

作者闻翔，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北京 100872）。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5)04-0117-10

## 一、引子：一篇二十多年前的檄文

2000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两位学者彼得·阿贝尔（Peter Abell）和黛安·雷尼耶（Diane Reyniers）在老牌学术期刊《英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社会理论的倒掉》（*On the Failure of Social Theory*）的评论文章。从标题就可以看出，这是一篇言辞颇为激烈的“檄文”。<sup>①</sup>这篇檄文讨伐的对象，则是西班牙裔著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于1996年出版的名著《网络社会的崛起》。<sup>②</sup>卡斯特通常被认为是研究网络社会的最重要社会理论家之一，《网络社会的崛起》则是其代表作——信息时代三部曲的第一部。正是在这本书中，卡斯特宣告了一个以全球化和信息化为基础的新社会形态——“网络社会”的到来。但是，在阿贝尔和雷尼耶看来，卡斯特的这本书却是一本彻头彻尾的失败之书，甚至还代表了在他们心目中“社会理论在智识上已经破产”的一个典型案例。

阿贝尔和雷尼耶对卡斯特的指责主要包括以下几点：文风非常随意和散文化，与现代社会科学所要求的精确严谨相差甚远；对重要概念（例如“网络”）缺乏清晰定义，但又大量炮制新名词（例如“无时间之时间”）；很多段落要么毫无意义无法理解，要么就可以有多种解释因而容易引起歧义；书中大部分文字是多余的，其实质内容完全可以用很小的篇幅就说清楚。同时，他们认为卡斯特对经验资料的使用也非常有选择性，甚至刻意忽略了那些不支持其结论的数据或前人研究。在他们心目中，卡斯特这本书其实

<sup>①</sup> Peter Abell and Diane Reyniers, “On the failure of social theor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4), 2000, pp. 739–750.

<sup>②</sup>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I), Oxford: Blackwell, 1996.

也代表了社会理论著述的典型文字风格。两位作者称之为一种“刻意的蒙昧主义”(wilful obscurantism)。<sup>①</sup>他们甚至给出了这样的酷评：“卡斯特书中的任何章节都不会轻易出现在任何一本符合严肃评审标准的社会科学期刊上。”<sup>②</sup>此外，他们还指出，尽管该书讨论的对象是网络社会，但是卡斯特却似乎对相关技术文献并不了解，这也代表了社会理论的另一个典型特点：文艺范十足，但却“对任何相关的、以技术为基础的社会科学一无所知”<sup>③</sup>。

两位作者还特别强调，卡斯特的辩护者可能会说，社会理论的范式本身就是多元的，卡斯特这本书只是没有秉承批评者心目中那个社会理论的理想范式而已。在阿贝尔和雷尼耶看来，这种拿研究范式的多元主义来做“挡箭牌”的辩护逻辑是不成立的，因为即便存在各种各样的研究范式，不同的范式之间固然可以美美与共，但是它们仍然需要共享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学术共同体对于现代学术的基础共识。而卡斯特的写作在他们看来显然已然背离了这个共识。

但是，两位作者又指出，即便如此，卡斯特的理论仍然对很多人——包括但不限于社会学同行——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甚至具有很强的传播效果。对于社会学内部的受众来说，卡斯特（也包括其他社会理论家）特别容易吸引那些年轻学生以及一些没有一技之长的学者，他们“前赴后继”地加入到这个事业中来，以一种艺术范的框架来构建社会理论，就此而言社会理论研究的欣欣向荣不过是一种自我扩张和内部循环，“导致了一种自我维持的次优平衡”。在他们看来，卡斯特“范”的社会理论“对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产生了可悲的影响，让他们浪费时间在巨量的繁文缛言中辗转跋涉”。<sup>④</sup>对于社会学外部的普通受众来说，他们之所以被吸引，则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理论作品提供了一些看上去十分抓人的“预言性词汇”，既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又能让外行人不用任何困难就能够借此卖弄和吸引眼球。

阿贝尔和雷尼耶在彼时已经是颇为资深的学者，并非初出茅庐的后生小子要靠挑战卡斯特这样的学术明星来博取关注。但是，这篇书评与学术批评常见的“文明礼貌”或节制矜持截然不同，可以说敌意十足，而且这种毫不掩饰的敌意并不仅仅针对卡斯特一人，而是指向了整体意义上的社会理论研究。

因此，在这里，之所以要重新捡起这段二十余年前的公案，并不是因为我们关心卡斯特个人的著作到底是否如两位作者所批评的那样不堪——对此卡斯特已经在次年发表于同一杂志的回应文章中做出了同样毫不客气的反击：一方面，他通过列举若干具体实例来表明这些批评大多是断章取义、自相矛盾，甚至包含了人身攻击，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即便他个人的研究确如两位作者所指控的是失败的，也不能代表所有的当代社会理论都应当受到谴责。卡斯特进一步指出，对于阿贝尔和雷尼耶来说，“他们的全部目的似乎就是要通过一个他们特别不喜欢的个案来摧毁当前社会理论的整体事业”<sup>⑤</sup>。正如卡斯特所言，阿贝尔和雷尼耶的批评的确以一种较为极端的方式昭示了一股趋势，且这个趋势在今天可能比二十多年前更加明显：那就是在西方社会学界，对卡斯特所代表的——（用卡斯特自己的话来说）“元分析”(meta-analysis)意义上的社会理论写作——的祛魅、失望乃至否弃，正在暗流涌动。所谓“元分析”，是指“将大量社会科学证据整合到一个相对连贯的解释体系中，支撑一系列分析性命题”<sup>⑥</sup>，从而在宏观层面上揭示甚至预测技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世界性变迁的整体过程和趋势。虽然社会学直到今天在总体意义上仍然是一门看重“理论化”甚至可以说是理论驱动(theory-driven)的学科<sup>⑦</sup>，但是却已经在不知不觉间与这种特定的社会理论生产与写作样式拉开了距离。

## 二、“预言”的终结

阿贝尔和雷尼耶对卡斯特的批评，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社会学家 C. 赖特·米尔斯早在 20 世纪

①②③④ Peter Abell and Diane Reyniers, "On the failure of social theor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4), 2000, p. 748, p. 740, p. 743, pp. 749-750.

⑤⑥ Manuel Castells, "A rejoinder to abell and reyniers' failure of social theor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2(3), 2001, p. 542, p. 544.

⑦ Max Besbris & Shamus Khan, "Less Theory, More Descrip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35(2), 2017, pp. 147-153.

50年代对当时的社会理论巨擘，以“无可救药的理论家”自称的塔尔科特·帕森斯的批判。任何一个读过米尔斯的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读者应该都对这一批评不会感到陌生。其批评的激烈程度，以及一些具体的批评面向，都与四十余年后阿贝尔和雷尼耶对卡斯特的批评如出一辙。

例如，与阿贝尔和雷尼耶对卡斯特冗长散漫的行文风格的指责一样，米尔斯认为帕森斯的代表作《社会系统》“只有50%的陈词滥调；40%是众所周知的教科书式社会学……剩下的10%可能有意识形态的用途”<sup>①</sup>，他甚至提出如果他来改写的话至少可以节约400页的篇幅（全书总共555页）；与阿贝尔和雷尼耶对卡斯特炮制大量华而不实的新概念的指责一样，米尔斯也认为帕森斯在《社会系统》中搭建了一个由各种抽象概念组合拆解相互嵌套而成的概念王国；与阿贝尔和雷尼耶对卡斯特虽然写“网络社会”但却不了解关于“网络”的硬知识一样，米尔斯也批评帕森斯虽然试图构造一个关于现代社会的系统理论，但这个系统理论却不接地气，无法落实到具体的社会现实层面。

但是，阿贝尔和雷尼耶对卡斯特的批评，与米尔斯对帕森斯的批评，仍然存在一个根本的区别。米尔斯其实仍然站在社会理论的内部，他所批判的不是社会理论研究本身，而是帕森斯的系统理论的抽象化、形式化取向——按照米尔斯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宏大理论“沉溺于句法，却无视语义”。<sup>②</sup>句法是形式，语义则是实质性的经验内容。米尔斯指出，“这种宏大理论的所谓系统性，就在于它撇开了任何具体经验问题的方式”<sup>③</sup>。而米尔斯自己关于美国社会的三部曲《权力新贵：美国的劳工领袖》《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权力精英》，则揭示了1940年代以来美国从“公众社会”（public society）到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的转型，这本身仍然可以被视为一种具有“实质性”的社会理论研究，而不仅仅是狭义的劳工研究、白领研究或精英研究。<sup>④</sup>但是，阿贝尔和雷尼耶对卡斯特的批评，却是完全站在社会理论的外部发起挑战，他们并非批评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的论述过于抽象或缺乏经验性，而是批评其关于时代变迁的实质判断本身是不扎实、缺乏实证根基和花哨的。在他们眼里，卡斯特和他的理论家同行们“将注意力集中在重新命名复杂的趋势，而不是阐明潜在的因果机制”，事实上，“社会理论家倾向于避免对经验的复杂性进行详细分析”。<sup>⑤</sup>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理论所给出的变迁预言，不过只是一堆吸引眼球的新词汇。而且这种类似某种新纪元即将到来的泛泛而谈，正是他们认为当代社会理论的一个典型特征，在今天社会学已经充分实证化的背景下，是大而无当的，是学科进化过程中需要被舍弃的剩余物。如此看来，即便是米尔斯活到今天，他关于“大众社会”到来的预言，也会被阿贝尔和雷尼耶视为空谈阔论。

因此，阿贝尔和雷尼耶所谓的社会理论的“倒掉”（failure），归根到底，其实是指社会理论固有的用宏大叙事来勾勒时代变迁、以富有冲击力的标签式概念来划分新纪元的内在冲动的失败。例如贝克的“风险社会”、贝尔的“后工业社会”、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鲍曼的“流动现代性”……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往下罗列，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当代重要的社会理论家都有其关于新时代即将到来或已经到来的标识性概念。

但是，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颇为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社会理论家在西方社会学的象征权力分配中仍然占据着近乎笼罩性的地位，任何一部社会学史或社会学概论的基础教材几乎都是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滕尼斯等经典社会理论家的“点将录”或编年史，而像布迪厄、吉登斯、哈贝马斯、福柯、埃利亚斯、鲍德里亚、鲍曼、卡斯特这些当代的“大名头”社会理论家，则更是今天这个时代人人皆知的公共学术明星，成为社会学在面对外界时的招牌式面孔。像“风险社会”“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流动现代性”——当然也包括卡斯特的“网络社会”——已经成为人们理解当代世界的一些基础图式，至少是在讨论相关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时约定俗成的一些分析框架。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理论似乎并未像

①②③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8、48、67页。

④ 闻翔：《从大众社会到社会学的想象力——理解米尔斯的一条内在线索》，《社会》2012年第4期。

⑤ Peter Abell and Diane Reymiers, “On the failure of social theor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4), 2000, p. 748, p. 747.

阿贝尔和雷尼耶在那篇檄文里所宣告的那样，应当破产或已经破产。

但是另一方面，在阿贝尔和雷尼耶发表那篇檄文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回头来看，我们会发现，在新生代的西方社会学者中，的确已经很少有人用卡斯特那样的方式进行社会学的知识生产，尤其是推出更新版本的“时代预言论”。虽然年轻学子在刚开始接触社会学这门学科时很容易被这些社会理论家或复杂广博无所不包或大开大阖汪洋恣肆的风格以及对于时代充满洞察力和穿透力的标识性概念所吸引，但是一旦当他们进入到真实的职业生涯时，却几乎很少会选择成为与他们的前辈一样的人。与阿贝尔和雷尼耶在当年的檄文中痛心疾首于一代代学生“前赴后继”加入卡斯特“范”的社会理论事业相比，如今，年轻一代学者很少将自己定位成纯粹的社会理论研究者，而基本上都深耕于一两个社会学的专门领域，致力于分支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证研究。“做理论”，尤其是那种以关于现代社会的结构性、体系性、综合性论述为特征的“大理论”，在今天不再是社会学家学术道路的主流选项。相反，局部领域、技术领域的中层理论的推演、发明与验证才是当下社会学的理论工作的主流。今天可能已经很少有学者试图像过去的学科前辈一样再次提出一个“××时代”“××社会”“××现代性”正在到来的预言。虽然大多数人仍然会在自己的研究中对以上提到的这些大名头社会理论家保持“行礼如仪”般的礼节性引用，但却往往仅限于将他们宏大的“时代预言论”当作一个笼统的背景，更不会再有“彼可取而代之矣”的创造野心或抱负。换句话说，阿贝尔和雷尼耶所谓社会理论的“倒掉”，本质上指的是以“时代预言论”为特征的社会理论写作范式的式微，或者说，“预言”的终结。

### 三、“预言”何以终结？

“预言”为什么会终结？一方面，这种频繁定义新纪元的理论“翻新”的确会给人一种审美疲劳之感，甚至让人觉得无所适从，有学者曾经对此抱怨过：“我们到底是生活在后现代性之中，还是生活在反思现代性之中，抑或生活在第二现代性之中？我们到底是生活在风险社会之中，还是事件社会之中，抑或信息社会、网络社会之中？又或者，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sup>①</sup>换句话说，如果时代的“牌子”真的这么轻易就被翻过去的话，那么，我们又何必如此匆忙地赶着做出下一个预言呢？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就曾经告诫过他的社会学同行，历史不是概念或理论的历史，我们不能“把概念当作历史行动的主题”。<sup>②</sup>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理论家过于急切地希望给时代一个新的命名，可能只是出于“影响的焦虑”心理而进行的概念发明竞赛，为的是给对当代社会的分析打上一个与前人不同的、属于自己的原创性标记。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sup>③</sup>这句话几乎被所有的社会理论家引用过，但大多数人却或许下意识地并不将自己放在马克思所说的“人们”之列，因为他们总是急于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另一方面，预言的背后往往带有某种二元论的取向，即将过去和当下（以及当下将要通往的未来）截然分开。史学家彼得·伯克曾经指出人们往往有一种“时间上的偏狭主义”倾向，“即在我们的时代和整个未加区分的过去之间做出简单的区分”。<sup>④</sup>事实上，这样的二元论取向的确曾经是 19 世纪中叶社会学在诞生之初的一个突出特征。古典社会学家们有着强烈的断裂意识，面对现代性到来的古今之变，他们敏锐地察觉到时代与人心的剧烈变动，于是，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梅因）、从军事社会到工业社会（圣西

① Therborn G., "At the birth of second century sociology: Times of reflexivity, spaces of identity, and nodes of knowledg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1), 2000, p. 42.

② 皮埃尔·布迪厄：《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如何获得自由？》，载《社会学的问题》，曹金羽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98页。

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页。

④ 彼得·伯克：《什么是知识史》，章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7页。

门)、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滕尼斯)、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涂尔干),诸如此类一系列的传统 vs. 现代二分法在古典社会学家的笔下应运而生。而且,在当时社会学初创、亟需建立学科合法性和学科身份认同的背景下,这种关于新时代到来的预言恰恰体现了社会学作为一门因应新时代而生、以洞察和处理新问题为己任的新学科之存在价值。经典社会学家们恰恰是通过这一系列二分法或时代预言将一直萦绕在世人心头、但却始终找不到语言来表达的感受用最具有张力同时却也最精准的方式表达出来,由此也确立和展现了社会学这门新学科的问题域和独特之处。

鲍德里亚曾经说过,人们越是靠近断裂时刻或开端时刻,就越能看清楚事物本身。<sup>①</sup>但是,为什么这样的断裂意识,或者说历史意识,在今天的社会学写作中却反而面临着诸多犹疑或挑战呢?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到底要如何才能确定自己恰好处在断裂时刻?小说家伍尔夫可以在《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中断然宣称,在1910年12月前后,人性改变了。<sup>②</sup>但是,社会学家并不是伍尔夫。社会学家甚至也并非哈利·波特,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站立的地方就一定是国王十字车站的9¾站台,呼啸而来的时代列车马上就会将我们带去一个崭新的霍格沃茨世界呢?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曾经敏锐地指出,即便在法国大革命这样以彻底革除旧制度为己任的重大历史事变面前,时间也并不曾划开一道翻天覆地的分水岭,反而,大革命前后的几代人在心性上是如此相似,以至于他们仿佛要跨过历史的鸿沟携起手来。<sup>③</sup>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在反思传统 vs. 现代二分法时也提到,古典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大多数关于现代性的理论都将现代视为理性的,历史是一张从传统社会的原始蒙昧而来、通往祛魅世界的单程船票,但是,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世界大战、大屠杀和种族灭绝事件,恰恰打破了这一现代性的想象。人们不能仅仅将这些事件视为现代性的失范,相反,图腾、禁忌、圣俗之分这些原来被认为只适用于原始社会的认识论工具仍然继续适用于现代社会,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必须被打破,人们才能真正认识现代意识的本质。<sup>④</sup>在这个意义上,断裂或许并没有发生。

因此,如果说真的存在某种断裂时刻的话,我们看到的也是在社会学学科内部的断裂时刻:从古典社会学传承而来的时间叙事的二分法或者说时代预言范式在今天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在今天的社会学家看来,过于简化的时代二分法很有可能遮蔽掉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社会过程的丰富性和多义性被一种狭隘的线性叙事所覆盖,而这种线性叙事总是以某个关于未来的目的论预言作为终点。在这种叙事当中,对当下经验的细致入微的考察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将当下装进这个目的论“套装”当中,无论其剪裁是否合体。德国思想家克拉考尔曾经针对历史学做出这样的评论:“历史学家处理的单元越大,他面临的诱惑越大,越容易陷入具有预言意味的有目的的历史建构之中。”<sup>⑤</sup>将克拉考尔这句话中的“历史学家”换成“社会学家”,或许依然成立。

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像阿贝尔和雷尼耶这样的批评者,才会对“时代预言论”版本的社会理论怀有如此之深的敌意。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在年轻世代、接受了越来越实证化的系统训练的社会学家的著述中,这种版本的社会理论才会呈逐渐式微之势。

#### 四、“预言”终结的非预期后果

对理论翻新的审美疲劳与对二元论/目的论的反思结合在一起,导致阿贝尔等人所批评的“时代预言论”版本的社会理论写作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中逐渐式微。但是,正如西谚“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所形容的那样,“预言”的终结也伴随着内在于“预言”写作的总体视野和历史意识被忽视和弱

① 让·鲍德里亚:《鲍德里亚访谈录:1968—2008》,成家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70页。

② 弗吉尼亚·伍尔夫:《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载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瞿世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

③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④ Jeffrey C. Alexander, “Recovering the primitive in the modern: The cultural turn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ociology,” *Thesis Eleven*, (3), 2021, pp. 1-10.

⑤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历史:终结之前的最终事》,杜玉生、卢华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19页。

化,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非预期后果”<sup>①</sup>,其中最为重要的包括:研究尺度的“盆景化”、认识论的“当下主义”以及问题意识的“去结构化”。

### (一) 研究尺度的“盆景化”

阿贝尔和雷尼耶自己的研究专长主要在方法论领域,例如社会科学的模型建构、因果推断等。在这种强调严谨的论证逻辑与技术程序的方法专家看来,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的宏大论述是四处漏风、缺乏坚实可靠的经验根基的。在书评中,他们也非常明确地给出了这样的判断:“当卡斯特这类社会理论家试图把一切整合在一起的时候,一切都分崩离析了。整体不如部分之和。”<sup>②</sup>在他们看来,这种整合性的、无所不包的“元分析”本身是靠不住的。所有的社会研究工作首先应当是方法驱动的、由方法来给予合法性保障的研究工作。换句话说,应该是谨慎的、有节制的“实证经验主义”。

但是,这种小心翼翼的“实证经验主义”实践起来,却往往会蜕变为研究尺度的“盆景化”。这里“尺度”(scale),并非通常意义上的题材是否大胆或敏感意义上的“尺度”,而是指在选择研究对象时的视野和范围。所谓研究尺度的盆景化,则是指将研究视野局限在一个狭小、既定的局部范畴内,既无能力也无魄力对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结构性和宏观过程进行讨论和把握。于是,研究者只能得到一个个碎片化的、具体而微的经验研究,但却缺少了对当代社会的结构、形貌以及动力的整体性把握。这种小尺度的研究,类似于小型盆景,被封闭在玻璃展示柜中,虽然精致,但却很难从中获得关于社会总体的知识与理解。<sup>③</sup>而这样的理解,归根到底也应当是精神性的理解,是关于社会乃至文明的精神气质(ethos)及其变迁的理解。但是在“实证经验主义”的价值判断中,精神性的理解却是应当保持距离的“软科学”,不够“硬核”。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理论家阿多诺在回顾其二战流亡美国期间在职业生涯上遭受的挫败时曾经说过,“不管怎样对社会进行批评,不管怎样意识到经济诸因素的决定地位,但是对我来说,精神的绝对重要性就如同神学教义,它从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sup>④</sup>。而他在美国获得的教训是:这种不证自明并非绝对有效。因为每当他试图对当代社会的精神气质给出判断时,他总是能够遇到这样的质疑:“证据在哪里?”证据当然重要,但是过于拘泥于所谓的实证判断,则会导致“世界观”(worldview)在社会学中的消失。在很多时候,我们从大量的实证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中其实是看不到社会学家自己的世界观的。我们只知道他描述了一个现象,甚至总结了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联(通常是在统计意义上),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从这个现象中看到了什么,尤其是这个现象与他对世界、时代和人们生活本身的判断之间有什么关系。

### (二) 认识论的“当下主义”

前文已经讨论过,“时代预言论”往往会陷入目的论的历史建构中,“当下”的经验被剪裁进入目的论“套装”,而遑论这个套装是否妥帖合身。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今天的社会学就应当从历史叙事和时代预言(这两者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中彻底抽身,完全退回到当下呢?阿贝尔和雷尼耶对卡斯特的批评,最大的风险其实恰恰在这里。

回到当下,仅就字面意义而言,是一个无比正当的主张。如果说回到当下意味着扎根于当代生活的经验之中展开细致耐心的观察,对社会事实进行具体切实的分析,这自然是毫无争议的。但是,如果回到当下变成了一种认识论上的“当下主义”(presentism),甚至沦为一种目光短浅的经验主义,那么风险就随

① “非预期后果”(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参见Merton,“The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Purposive Social Ac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6), 1936.

② Peter Abell and Diane Reymiers,“On the failure of social theory,”*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4), 2000, p. 749.

③ 关于对“盆景化”的经验研究的讨论,参见闻翔:《“双重危机”与劳工研究再出发》,《清华社会科学》第2卷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307页。

④ 阿多诺:《一个欧洲学者在美国的学术经历》,赵勇译,载赵勇:《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11页。

之而来。问题在于，在今天的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中，可以看到很多更接近于后者的实践。

所谓认识论的“当下主义”，按照英国社会学家英格利斯的讲法，即“在特定的分析模式中不经意、不明显地将当代的关切和倾向置于优先地位”。<sup>①</sup> 英格利斯指出，相比之下，历史意识，以及对长时段的历史变迁的把握能力，除了在历史社会学这样一门社会学的分支领域之中仍然被强调之外，已经不再为大部分社会学家所重视。<sup>②</sup> 循着英格利斯的讲法，我们当然需要承认，时代预言版本的社会理论尤其是其二元论的预设的确有简化之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放弃对长期历史动力的复杂性与宏观结构变迁的把握。回到当下，并不应该意味着将过去与未来全部抛在脑后。预言的终结，也并不应该意味着对社会演进的动力机制的探寻的终结。

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曾经如此激烈和决绝地写道，“普遍历史根本没有从野蛮走向人道主义，而只是从弹弓走向了百万吨级的核弹”<sup>③</sup>——这当然与他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所引发的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反思有关——而今天的社会学家已经过于小心翼翼以至于无法对时代的趋势和走向做出总体判断，所谓的“普遍历史”本身甚至成为需要被反思和怀疑的对象。对“时代预言论”的拒绝或否弃，如果建立在认识论的当下主义和经验研究的盆景化基础之上，那么，其最根本的悖论在于，将当下（或者任何一个时刻中的人或事）视为独立的（因为只有当下是可以实证地把握和测量的）的研究单位，就此，“普遍历史”所预设的时间的结构性和历史进程的连续性则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对“时代预言论”的拒斥本身恰恰陷入一种非连续主义的历史观。而“时代预言论”，看似强调古今之别，但其实却并没有排斥历史的连续性观念，因为当下固然是古今之间的分水岭，但既然是分水岭，则其仍然是在自古至今的时间脉络中延展开来的，是既有“来龙”也有“去脉”的，而并非简单截取和割裂出的一个独立单位。

“当下主义”可能还会造成一个更加隐秘的后果，那就是对当下的绝对化和合法化。休厄尔曾提醒人们，资本主义的长期维系（尤其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一种特殊的时间感，即时间是无限的、渐进的，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时代好像会无限延续下去。<sup>④</sup> 这种时间感恰恰构成了“当下主义”取向的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不被反思的潜在预设。阿多诺指出，“盛行的经验主义正在截断经验。将事实归结为事实，无视其突出的历史性及其历史意义”，这样做的后果是“事实被绝对化了，失去了它的起源，于是它就显得是自然而然的东西，因而原则上是不可质疑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消除历史维度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它可以使当前发生的任何事情合法化和合理化”。<sup>⑤</sup> 换句话说，预言的终结不应当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学的探寻的终结。

### （三）问题意识的“去结构化”

“时代预言论”就其本质而言是对时代趋势及其背后的主导社会力量和机制的把握和判断。而所谓趋势，一定是与总体社会结构的转型关联在一起的。米尔斯指出，社会学家“往往试图聚焦于每一股只比其现状稍稍超前一点点的趋势；更重要的是，我们试图同时观察全部趋势，视之为组成时代总体结构的变动中的各个部分”。<sup>⑥</sup> 因此，“元分析”以及“预言”，内在就具有总体性的问题意识，是面向总体意义上的社会历史结构来发问的。但是在元分析式微、预言被放逐的当代西方社会学中，流行的则是各种基于具体情境和数据驱动的行为科学理论，各种基于文本、话语、身体分析的微观理论，各种基于性别、族群和地域的身份政治理论，以及各种围绕情感、认同和意义建构的个体理论。对个体行为、微观情境、身份政

① David Inglis, “What is Worth Defending in Sociology Today? Presentism, Historical Vision and the Uses of Sociology,” *Cultural Sociology*, 8 (1), 2014, p. 100.

② 英格利斯所谓的“长时段”，不仅指西方自16世纪以来的现代性时期，而是指人类历史几千年来演进，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西方，而是包含整个世界。

③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78页，译文有改动。

④ Sewell, William H., “The Capitalist Epoch,” *Social Science History*, 38(1), 2015, pp. 1-11.

⑤ Theodor Adorno,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49.

⑥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第213页。

治、主体建构的讨论遮蔽了对社会历史结构的关切，这就导致了问题意识的“去结构化”。

虽然社会学直到今天仍然是一门以社会结构为核心概念的学科，但在当下的实践中，趋向社会历史结构的总体性问题意识则已经显得过于笨重、僵化、“大而无当”而被日渐疏远。而悖论在于，与过去的 20 世纪相比，21 世纪的头二十多年，恰恰是总体结构变动最为剧烈、甚至诸种不确定性也最为凸显的二十多年。整个世界正在目睹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洗牌、战争风险的加大、民粹化趋势的扩张以及人工智能给经济和社会秩序带来的种种挑战，但是，预言的终结，却导致了在社会历史结构发生最为剧烈变动的时代，社会学家“不仅不再尝试把握这种结构，甚至还不承认它们本体论上的现实性”。<sup>①</sup> 这种问题意识的“去结构化”也使得在很多人心目中，当代西方社会学在今天越来越失去其在政治上的相关性和智识上的吸引力。

## 五、余论

美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曾讨论过社会学的“职业退守”（professional regression）问题。所谓“职业退守”，是指随着学科的进化，学科的从业者逐渐退守到固化的问题领域、方法工具和学科边界之中，例如阿伯特就批评在美国社会学家“退守到对数据进行方法上正确的分析，却把对当代美国社会生活进行总体解释的任务交给了人文领域的教授们，尽管后者中很多人的经验知识在社会科学家看来相当懵懂”。<sup>②</sup>

上文所讨论的“预言”的终结所带来的一系列非预期后果，或者说当代西方社会学知识生产的诸种局限，从根本上讲恰恰是社会学家“职业退守”的一个表征。当社会学家不再对社会生活的总体趋势产生好奇，不再对历史与结构的变迁脉络保持敏感，不再对我们所身处的大变局时代的动力机制维系关切，而是自我淹没在细枝末节的狭小研究中，被专业化的条条框框所束缚却又宣称忠于日常生活经验和实证学术规范本身，那么这样的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其实只是一种退化的、保守的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只是学院内部的一种知识生产游戏。

如果走出学院的围墙，我们会发现，今天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遍地社会学家的时代，调查记者、非虚构写作的写手，甚至短视频平台的内容生产者（例如户外旅行博主、生活方式博主、行业探秘博主）做的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社会研究，他们的工作为人们打开了社会世界的各个角落，使人们对社会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在浮现的群体保持关切和好奇。那么，与这些“业余社会学家”相比，“职业退守”的社会学家们，其竞争力究竟在哪里呢？就像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家所拥有的，不就是超越于个人困扰和局部情境之上的对于时代和结构变迁的想象力吗？不就是看到大图景（big picture）、面向大议题（big issue）、发出大哉问（great question）的能力和勇气吗？“预言”的终结，或许也意味着社会学想象力的受缚。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危机恰恰在这里，而并非像阿贝尔和雷尼耶所批判的那样源自卡斯特“范”的元分析和预言式写作。

当然，以上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的语境中展开的，如果以此来反观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的话，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历史缘起、定位与当代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学家对社会学何以可能、何以可为的认识与想象，都与西方有着相当大的不同。这也造成了“时代预言论”范式的社会理论写作在中国并没有像在西方那样被彻底边缘化，而是面临着一个更加复杂的处境。

首先，中国社会学乃至广义上的社会科学本身就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传统中国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断裂时刻舶来和发展起来，这种断裂感构成了中国早期社会学前辈在面对现代性时的基础“感觉结构”。因此，“时代预言论”所内在的历史意识，恰恰是中国早期社会理论在发轫之初的一个鲜明底色。无论是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借春秋三世说所预言的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

① 小威廉·休厄尔：《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朱联璧、费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74 页。

② Andrew Abbott, *Chaos of Disciplin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 146.

的历史进化路径<sup>①</sup>，还是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以及一系列其他作品中对新国和新民的召唤与想象<sup>②</sup>，抑或严复以赫胥黎“天演论”为张本对帝制中国的传统循环史观的突破与再造<sup>③</sup>，恰恰都体现了这一点。而到了1980年代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新的断裂感与历史意识亦出现在新时期社会学人的研究中，这主要体现在发展社会学作为一门重要的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引入和流行。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的21世纪头十年，出现了一系列带有“时代预言论”色彩的重要著述，例如李培林对“村落的终结”的田野研究<sup>④</sup>，孙立平对“断裂社会”的三部曲研究<sup>⑤</sup>，沈原对“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再形成”的纲领性研究<sup>⑥</sup>，渠敬东等人对“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开创性研究<sup>⑦</sup>，等等。这些研究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甚至分别在社区研究、转型研究、劳工研究、国家治理研究等具体研究领域起到了议题开创和范式引领的作用。

但是，最近十年来，伴随着发展社会学在中文学界的逐渐式微，这种直面和叩问总体结构转型的社会学研究已经不多见。虽然亦零星出现了一些明确宣告“某某社会”正在来临的研究，例如王天夫提出“焦虑社会”的来临、张兆曙提出“平台社会”的来临、王水雄提出“游戏化社会”的来临、文军提出“个体化社会”的来临，这些研究分别从社会心态、技术变革、生活方式、社会联结与组织方式等维度揭示和预言了社会变迁的某种趋势与方向。<sup>⑧</sup>但是，这样的研究往往是孤立出现的，且数量上并非太多，而是太少，并没有形成培风积云的学术气候。对总体社会结构变迁趋势的观察和分析，在当下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中，其实并没有得到足够和充分的关注和重视。研究尺度的“盆景化”以及问题意识的“去结构化”，在今天的中文学界亦不同程度地存在。

其次，在具体的社会研究和社会分析中，中国社会学其实有着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并没有为“时代预言论”所内在的二分法所束缚，去简单割裂过去与当下之间的关联。相反，中国社会学在传统上始终重视和体认历史深处的内在连续性。或者说，将历史进程中的变与不变勾连起来，其实是中国早期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例如，在中国早期社会理论的代表性作品——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其实揭示的就是历史的连续性，这尤其体现在费孝通关于“中国基层社会的性质一直是乡土性的”这一判断中。再比如，新时期社会理论的一个代表性文本，甘阳著名的“通三统”之说其实强调的也是在20世纪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文明传统与市场自由传统之间的贯通<sup>⑨</sup>，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的进程、文明的基质是一个层层累积的过程，而不是各个片段之间彼此彻底断裂的。中国社会学人在田野和经验研究中所着力探寻的“社会底蕴”，强调的亦是对历史变迁中的恒常与连续性的把握。<sup>⑩</sup>

但是，这种重视历史与当下之间关联的优良传统，在当下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中，却也正在面临日

① 康有为：《大同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另参见渠敬东：《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统》，《社会》2015年第1期。

②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③ 赫胥黎原著，严复译注：《天演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④ 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⑤ 参见孙立平的“断裂社会”三部曲。（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⑥ 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⑦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⑧ 王天夫：《焦虑社会及其根源》，《北大社会学刊》2023年第2辑；张兆曙：《虚拟整合与平台社会的来临》，《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王水雄：《从“游戏社会化”到“社会游戏化”——网络时代的游戏化社会来临》，《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0期；文军：《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与包容性社会政策的建构》，《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⑨ 甘阳：《通三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⑩ 杨善华、孙飞宇：《“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社会》2015年第1期。

渐淡化的趋势。除了革命社会学、口述史研究和社会记忆研究等少数以历史本身为研究对象的例外领域<sup>①</sup>，以历史作为分析视野、解释线索和意义框架的进路，在关于当代社会经验和社会事实的研究中，其实并不多见。相反，历史逐渐退隐，成为当下的一个遥远而模糊的背景。认识论的“当下主义”，也成为中国社会学知识生产需要直面和克服的局限。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与前文所讨论的当代西方社会学的困境相比，其实面临着一个更加复杂也更具张力的处境。但无论如何，作为“后发”的中国社会学，并不必然意味对西方的模仿和“尾随”。相反，我们要做的恰恰是以西方社会学的当代困境为镜鉴，在深刻体认自身的社会历史和文明脉络的基础之上，做出深深扎根于中国自身的民情与经验的社会研究和社会理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需要超越而非尾随，进取而非退守，一方面警惕和克服研究尺度的“盆景化”、认识论的“当下主义”以及问题意识的“去结构化”，另一方面更要以总体视野和历史意识来观照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经验实践，从而建构属于中国自身的、自觉且自主的社会理论。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2XNLG0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朱颖)

## The End of Prophecy and the Crisis of Social Theory

WEN Xiang

**Abstract:**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or so, the disenchantment of social theory in the sense of meta-analysis has become a notable trend in the production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Sociology, one of the prominent manifestations of this is the end of prophecy, i. e. the critique and alienation of the paradigm of social theory writing characterized by the prophecy of the times. The end of prophecy is mainly due to two reasons: the aesthetic fatigue brought about by the frequent renovation of theories defining the new era; and the reflection on the dualism and purposiveness of prophecy that separates the past from the present. However, the end of prophecy is also accompanied by the decline of the overall vision and the weakening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which brings a series of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including the bonsaiization of the research scale, the presentism of epistemology, and the destructurization of problematic awareness. This also reflects the dilemma of sociologists' professional regression.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in Chinese sociology needs to take the West as a mirror, to transcend rather than follow, to forge ahead rather than retreat, to look at Chinese modernization practices with an overall vision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thus to construct China's own social theory.

**Key words:** end of prophecy, social theory, dualism, bonsaiization, presentism, professional regression

<sup>①</sup> 例如，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2016年第4期；周晓虹、田毅鹏主编：《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为工业中国而斗争：鞍山钢铁公司口述实录（1948—2020）》，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年；胡洁、周晓虹主编：《集体记忆与多维叙事：比较视野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刘亚秋：《被束缚的过去：记忆伦理中的个人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